

从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 学术史、概念及范畴^{*}

——以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为中心

王继平 杨晓晨^{**}

【摘要】文化领域的抗战研究是从抗战文化史研究开始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抗战文化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1 世纪初以来，出现了由抗战文化史到文化抗战史研究的转变。文化抗战史与抗战文化史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20 世纪 40 年代，郭沫若提出了“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两个概念。文化抗战是指中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通过各种文化载体进行的抗日斗争，抗战文化则是文化抗战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对其进行历史考察便构成文化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文化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各有其研究范畴、范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主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抗战文化引领抗战文化的发展，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关键词】抗战文化；文化抗战；抗战文化史

文化领域的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文化领域的抗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化领域的抗战首先是从抗战文化的研究开始的，如抗战教育、文学、艺术、音乐、美术、出版、新闻等，都成为抗战文化研究的重点；区域抗战文化也成为研究的热点，除各抗日根据地之外，国统区特别是大后方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成为研究重点，重庆、桂林、永安乃至“孤岛”时期的上海等抗战文化繁盛地区更是吸引了众多研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18ADJ006）阶段性成果。

^{**} 王继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杨晓晨，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

者的目光,抗战文化研究的成果丰硕。近几年来,文化领域中的抗战研究开始引入“文化抗战”的概念。这是抗战文化研究的拓展与延伸,还是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本文拟从学术史梳理开始,探讨文化抗战的概念、范畴。

—

抗战文化史的研究是从地域抗战文化史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是著名的“文化城”,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声誉。20世纪80年代起,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料的收集和资料研究得以开始。1979年冬,《广西日报》副刊率先恢复了“桂林文化城忆旧”栏目。接着,自1980年起先后有《广西文艺》开辟了“烽火桂林”,桂林《漓江》开辟了“文化城忆昔”,《桂林文艺》开辟了“回顾文化城”,《桂林日报》开辟了“桂林文化城忆昔”等栏目;其后,广西社会科学院《学术论坛》开辟了“桂林抗日文化”,《广西社会科学》开辟了“桂林文化城研究”专栏。^①此外,四川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开展了对抗战文化的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了抗战文艺课题组,并于1981年创刊了《抗战文艺研究》(季刊)。由此,抗战文化研究的热潮兴起,到21世纪初进入繁盛时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经中国知网和国家图书馆的检索后,发现历年来发表的论文近300余篇,出版的著作有100余部(含资料集及研究著作)。出版著作的特点:一是关于具体文化领域的研究较多,如《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中国抗战文艺史》《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抗战音乐史》《抗战漫画》《抗战诗歌》《抗战电影》《抗战时期的中国戏剧》《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等;二是关于区域抗战文化的论著较多,主要集中在桂林、延安及解放区、重庆、上海等地,如《桂林抗战文化史》《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桂林抗战文学史》《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山东抗战诗文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重庆抗战文学论稿》《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抗战文学论稿》《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浙江抗战文化》《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保定抗战文化》,以及漓江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料》和《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等;三是出版了系列研究集刊和书系,如《抗战文化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包括学位论文),尽管所涉及的领域和区域相较研究著作更为广泛,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上述方面,也有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政策等论文,如《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政策及其启示》《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建构和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理论与实

^① 魏华龄:《近十几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践研究》《论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化》等。

以上抗战文化学术史梳理表明，学术界从抗战文化的视域对抗战争期间文化领域的抗战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在一些具体领域，如抗战音乐、抗战文学、抗战戏剧等，研究比较深入，成果丰富。

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抗战研究也存在另一种研究范式，即文化抗战的研究。20世纪末，袁丽容比较早地使用“文化抗战”来表述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文化领域的抗战活动。^①嗣后，间或有文化抗战的论文出现，如《吕振羽和湖南文化抗战》《郭沫若文化抗战的历史评价》《抗战全局视野下的桂林文化抗战》《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近几年来，从文化抗战的视野研究文化领域的抗战活动的论著日渐增多。主要论文有：《郭沫若文化抗战思想述论》《南方局与重庆文化抗战》《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述略》《重庆文化抗战运动发展述论》《抗战初期徐特立在湖南的文化抗战活动》《抗战时期郭沫若和茅盾的文化活动》等。在著作方面，则有：《历史不能忘记系列：文化抗战》《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文化抗战珍档——抗战文化的崛起民族精神的呐喊》，以及长城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先进军事文化探源》等。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领域立项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如近几年关于文化抗战立项的项目有：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2018）、生活书店与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学传播研究（2018）、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宣传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2017）、文化抗战与西南联大散文研究（2017）、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家群体研究（2016）、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2106）等。文化领域的抗战研究范式从抗战文化到文化抗战的转变，已然成为抗战研究的新发展。

二

作为学术研究类型的转换，文化领域中的抗战活动研究从抗战文化到文化抗战的研究转型，涉及概念、范畴以及研究范式等内容，也关联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拓展，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厘清。

关于“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郭沫若是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②其实，

^① 袁丽容：《郭沫若：“文化抗战”的主将和旗帜》，《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

^② “文化抗战作为一个术语，最初出现在郭沫若发表的《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中。郭沫若文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第一期抗战期间敌寇对我文化的侵略以及我文化抗战成绩的总结，第二部分是对第二期抗战期间敌寇对我文化侵略策略的改变以及我文化反攻的总结，第三部分是对今后文化运动的展望。郭沫若说：‘四年来的文化抗战的阵容，和我们整个抗战阵容一样，确是愈战愈强了，四年来文化抗战的战绩，确实增加了我们无限自信。’”陈艳辉：《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第13页。

抗战初期,文化界人士即论述了文化与抗战的关系,如南迁四川出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入川不久,便提出了文化与抗战关系的问题。他在《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会的讲演》《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与抗战的思想:“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相互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笔者考察民国文献,也阅读到不少民国人士在抗战初期就阐释了文化与抗战的关系。如罗家伦在1939年出版的《抗战与文化》一书,也提出了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近代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要看一国的胜败,不只是看他兵力的强弱,而且要看他国内文化水准的高下。”^①1941年7月,陈立夫在《文化之战》一文中说:“一民族文化之估价,往往因其经历有关存亡绝续之大战而确定。因为文化的力量,有时需要在战争中才能表现,而同时军事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文化而不是暴力。某一民族之文化而具有特种优点,亦即必为其制胜之道。”^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认识到文化与抗战的关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1931~1932年,中国共产党就先后颁发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抗日救亡领导责任的宣言,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的序幕。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动员全国人力、财力、物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积极转变策略,开始由苏区工农民主文化向抗日民主文化的思想转变,并结合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阐述了有关抗战文化的意义、抗战文化队伍的建设、抗战文化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主张,逐步形成了独具抗战特色的文化思想体系。^④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化战线的抗日斗争问题:“在我们为中国人

① 转引自孟丹青《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18页。

② 陈立夫:《文化之战》,《教育通讯(汉口)》第26/27期合刊,1941年7月12日。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568页。

④ 朱汉国、李小尉:《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可见，抗战初期，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就深刻认识到文化与抗战的关系，认识到文化领域抗战的重要作用，尽管没有使用“文化抗战”一词。

郭沫若的《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虽然没有对“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从标题看实际上就已经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从郭沫若在文中对文化抗战两个时期的叙述来看，他所指的文化抗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②在思想上，严厉地打击了“投降”理论，如“唯武器论”“三月亡国论”等谬论，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坚定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③文化界各部门都直接动员起来，大部分文化工作者都离开了大都市，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了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团等，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军队，走向农村。兵营、战壕、广场、田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了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一时的潮流。文化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普遍地提高了全国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与政治水准。^④各种杂志、小册子、通俗读物等大量出版，阐发了抗战建国必胜必成及其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障碍的理论。同时，各地小城市的小型报纸也广泛发行，壁报贴满了街头与乡村，书报供应社、文化服务社等更努力于报纸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大大地提高了一般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意义与任务的了解与认识。由此可知，郭沫若所说的文化抗战，是指文化机关、文化组织、文化人士运用各自的文化武器（形式）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科学研究等，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活动以及配合军事、政治方面抗日斗争的文化运动。

从郭沫若“文化抗战”概念的考察入手，学者陈艳辉将“文化抗战”内涵界定为抗战时期各文化机关、组织或文化人以各种文化形式唤起民众、凝聚民族抗战精神以支持军事斗争进而达到抗战胜利，外延包括文学、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音乐、漫画及其他一切文化形式。^⑤这是目前学术界对“文化抗战”所作的比较全面的一个界定，但她将思想战、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排除在“文化抗战”内涵之外是值得商榷的。在其他有关文化抗战的著作中，如《历史不能忘记系列：文化抗战》《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文化抗战珍档》《文化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先进军事文化探源》等，都只是叙述了具体文化的领域、部门、地区的抗战活动，如歌曲、诗人与诗作、电影、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海“孤岛”、桂林“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页。

^② 陈艳辉：《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第18页。

城”、重庆、海外、教育、媒体、文化设施、文艺等的抗战活动。

至于抗战文化的概念，郭沫若的《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在回顾了四年来的文化抗战以后，列举了“文化抗战的战绩”，即“文艺作家对于敌人惨绝人寰的种种残暴兽行的揭露，对于抗战将士们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故事的宣扬，对于各方面艰苦奋斗努力抗战建国的种种情形的描写；新闻工作者出入枪林弹雨采集前方战报向国内外报道，同时还在前后方创立与支持大型小型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报纸，致力于抗战的政治与督励；社会科学家勤奋地从事于革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国人对抗战事业有日益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而且经常地对于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等敌寇汉奸的有害言论作毫不放松的斗争，自然科学家埋头研究，从事抗战资源的考查与技术的探讨；教育家以及一般文化工作者努力于文盲的扫除，广泛的宣传与鼓动，普教方法的改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文化娱乐的设施；出版界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亦曾不稍懈地努力全国文化食粮的产出与供给——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文化战士们，四年来种种支持抗战帮助建国的业绩，是数不胜数的四年来的文化抗战的阵容，和我们整个抗战阵容一样，确是愈战愈强了；四年来文化抗战的战绩，确实增加了我们无限自信。”^①可见，郭沫若所说“文化抗战的战绩”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文化”。

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抗战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关于抗战文化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所谓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它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文化，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精神文化，即作为哲学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思想、理论、教育、社会科学等内容。^②有学者认为，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日战争服务和有利于抗战的文化。它“是一种以民族大义为前提，以多元政治为基础，以多种形式表现的文化，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所经历的一场沉重的历史劫难，又铸就了一个英雄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③也有的学者将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抗战文化运动的概念。比如高向远就认为，“抗战文化运动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工作者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及出版等形式，以反映抗战生活，促成抗战胜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密切地配合着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的抗日斗争，为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④学者文天行则认为：“抗战文化运动是反对日本帝

① 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23~324页。

② 唐正芒：《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③ 范松：《试论抗战文化遗产的定义分析及其他》，《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④ 高向远：《论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文化运动……以政治为基础、以群众为对象、以批判为武器，随时变而涌动。”^① 张文认为，抗战文化运动可以界定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在文化阵线上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运动。^②

也有的学者在具体论述抗战文化的论著中加以定义。如王福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在“绪论”中对桂林抗战文化的概念作了定义：“桂林抗战文化中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许多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而狭义文化，仅指文学艺术形式，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且将广义文化称为大文化，将狭义文化称为小文化。大、小文化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①大文化涵盖许多形式的小文化。②大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是小文化的理论基础，并决定小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谈论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就不能不谈其与广义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联系。而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和抗日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正是属于毛泽东指出的‘今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③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保山掌故》对滇西抗战文化也有一个界定：“‘滇西抗战文化’的概念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的。其核心是战争中中国军民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文化形态，它的载体还包括以下几点。①至今遗留在滇西地区的各种珍贵的战时文献、照片、实物、遗址、墓葬陵园、纪念设施、专题展室等。这些史料和遗迹是侵略和反侵略的铁证，是感召和激励后人庄敬自强的直观教材和文化旅游资源。②多年来，有关滇西抗战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关论著至少有数百万字。③取材于滇西抗战的各类作品，如文学作品、画册、音像制品、舞台节目、影视产品等。”^④

从以上学术界关于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概念的表述来看，抗战文化与文化抗战概念界定还是不够清晰。厘清这一概念，首先必须明了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是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分歧颇大的问题。但学术界一般都认同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则

① 文天行：《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15 年第 7 期。

② 张文：《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8。

③ 王福琨主编《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 1～2 页。

④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保山掌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 194 页。

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①目前学术界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一般都使用狭义的文化概念,以区别于文明的概念。我们也倾向于从观念形态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即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区域内创造的反映一定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这些成果包括理论思维的成果,即知识系统和社会心理与民族精神系统,亦即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思维方式、文学艺术、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等。从本质上来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③从上述关于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的概念表述来看,学术界是认同从狭义文化即观念形态的角度来界定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的。如果从广义的文化来界定,那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就无所不包,显然混淆了各个具体学科的界限。人类社会的任何存在都无不附丽着文化的因素,体现人们的观念、意识乃至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但那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因此,从观念形态来界定文化抗战、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是比较恰当的。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文化抗战等核心概念上还是有些混淆和不确定的。

三

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文化抗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抗战文化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因抗战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是文化抗战所形成的结果,是对抗战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反映;文化抗战则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文化领域或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以各种文化媒介(如报刊、电台、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学校、教育等)为武器,展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以此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以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形式之一。它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抗战一样,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鼓舞人民士气和激励民族精神的有力武器。文化抗战所形成的文化成果(现象、形态等)如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便构成了抗战文化。至于抗战文化运动,它是文化抗战的表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将文化概念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定义,即文化是“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第二类是“多元的相对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辞海》的“文化”定义也区分广义与狭义,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51页。

现形式之一。因此，抗战文化是文化抗战的结果，是文化抗战的研究范畴之一。

文化抗战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形式之一，它的主体是文化界，包括思想理论、新闻舆论、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文物博物等领域。其抗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如抗战戏剧运动、抗战歌咏运动，乃至国民政府推进的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是以运动的形式推进的文化抗战活动。但更多的形式，是文化领域的爱国人士以自己熟悉的文化载体，如作家的小说创作、诗歌吟诵、散文创作，音乐家的高亢旋律，戏剧家的戏剧（戏曲）演出，歌唱家的激情高歌，漫画家的讽刺幽默，电影人的电影制作，科学家的学术创造，教师们的爱国教学等，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武两个战线”的“文化战线”，而且“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文化抗战对于唤醒民族意识、激励人民信心、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文化抗战所体现、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史，就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文化领域的爱国人士以文化为媒介所进行的抗战的历史，以揭示文化抗战的成就——抗战文化以及它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文化抗战史的研究范畴，应从文化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审视，包括文化抗战指导思想、文化抗战组织形式、文化抗战运动、文化抗战方式（文化各领域如文学、艺术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科学、新闻等抗战方式）以及文化抗战的成果即抗战文化。

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文化抗战的纲领，是文化抗战政策、策略，包括文化抗战的意义、地位，文化抗战的队伍、任务、形式的指导性原则。1939年3月12日，中国国民党以抗战之名发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实际上是国民党文化抗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须认定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国民“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牺牲个人之自由”；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就是要“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在抗战时期“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要求确立的所谓“救国之道德”的“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而“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要求国民“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要求一切思想言论不能违反“三民主义”，不能“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否则就要“一体纠绳”。对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页。

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指出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为坚持统一战线，为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①各地的党组织要利用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使这一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以防止和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作为防共武器的企图。^②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精神相反，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思想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抗战思想，指出文化战线的抗日斗争，文化抗日的“军队”的重要地位，这就是毛泽东表述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③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发表文件、指示，要求积极开展文化领域的抗战运动，特别强调了文化抗战的四大任务。其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其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其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其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④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抗战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抗战思想。

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是确保文化抗战发展和胜利的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表达了在文化界建立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⑤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明确提出了“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此后不久，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

① 李勇、张仲田：《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卷》，群言出版社，2014，第214页。

② 李勇、张仲田：《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卷》，群言出版社，2014，第2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35页。

⑤ 有学者认为，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指出：在文化界、科学界、艺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妇女界、宗教界、医药界，尤其是在广大军队、国民党新旧党员和各级领导中，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增加；“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文化界共同抗日的愿望。刘仓：《略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石河子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武汉成立，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就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了论述，指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对此，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① 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② 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也指出：“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革命任务，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③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成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就是在这一组织形式下进行的。

文化抗战运动是文化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它是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是抗战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即已展开，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抗敌后援工作团、抗敌歌咏团、漫画宣传队等文化运动相继展开，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抗战运动工作，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宜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④ 在抗日根据地，“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要使各根据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7页。

②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57页。

③ 陈毅：《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江淮》1941年第5期。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526页。

上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①

文化抗战方式是文化抗战史的重要范畴,也是文化抗战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建立文化抗战团体,是文化抗战的重要方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为例,数量众多,分布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乃至海外华人社会。1937年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成立,艾思奇任主任(后由吴玉章接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它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运动的领导机构,也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成立。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成立。1939年2月7日,延安美术工作协会成立(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1939年2月10日,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成立,潘汉年任理事长,沙可夫任副理事长。1939年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边区文抗”)成立,周扬、萧三、沙可夫为常务理事。1940年年底,延安文化俱乐部成立,萧三任主任。文化俱乐部既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场所,也是一个组织和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团体。^②在国统区,也成立了许多中共领导的或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响的文化抗战团体。如在桂林一地,就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等众多文化抗战团体。在重庆,中共党员创办的重庆救国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以及重庆怒吼剧社、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重庆文化界抗敌支会。此外,全国各地也建立了许多文化抗战团体。如在成都,就成立了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还有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成都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成都少年抗敌宣传团、成都市工商抗日后援会、四川民众华北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527页。

② 黄华文:《抗日战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50页。

抗敌后援会、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成都市记者抗敌后援会、成都天明歌咏团、成都四川妇女出征军人家属救济会、成都星芒通讯社、战时教育协会、成都战时学生社、救亡抗敌宣传社，等等。^① 在西安，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民众抗战剧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艺促进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安市世界语学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等。在海外成立了很多华侨华人组织救亡团体。据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② 在遍布全国的文化抗战团体的领导与组织下，戏剧、电影、文艺创作、教育、科学以及群众文化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活动。

除了文化抗战团体有组织的文化抗战活动之外，爱国文化人士还以自己日常的工作方式进行着英勇的抗战，诚如郭沫若在《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中描述的那样：“文艺作家对于敌人惨绝人寰的种种残暴兽行的揭露，对于抗战将士们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故事的宣扬，对于各方面艰苦奋斗努力抗战建国的种种情形的描写；新闻工作者出入枪林弹雨采集前方战报向国内外报道，同时还在前后方创立与支持了大型小型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报纸，尽力于抗战的政治与督励；社会科学家勤奋地从事于革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国人对抗战事业有日益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而且经常地对于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等敌寇汉奸的有害言论作毫不放松的斗争，自然科学家埋头研究，从事抗战资源的考查与技术的探讨；教育家以及一般文化工作者努力于文盲的扫除，广泛的宣传与鼓动，普教方法的改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文化娱乐的设施；出版界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亦曾不稍懈地努力全国文化食粮的产出与供给”。^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宣传、教育、出版、文艺创作、文化活动均围绕抗战展开。如文艺宣传通过组织文艺团体上前线深入部队，走上街头、田间，深入民众进行救亡文艺宣传。陕甘宁边区文协下属的“抗日文艺工作团”，曾先后组织6个小组分赴晋察冀、五台山、河北、晋东南、陇海等前线开展救亡文化宣传。边区文抗会下属的数十个文艺小组，则经常走进工厂、街头、田间，用各种文艺形式，向工人、市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④ 戏剧创作与演出，美术创作与美术作品展览也是紧密联系全民抗战主题进行。抗战报纸杂志如雨后天春笋般遍布各抗日根据地。通过戏剧活动、文学创作、音乐活动、美术宣传、秧歌运动等各种形式，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士乃至士兵、普通民众都参与到文化抗战之中，激励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

① 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第95页。

② 〔澳〕彭小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的华侨》，《统一论坛》2018年第5期。

③ 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24页。

④ 黄华文：《抗日战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51页。

四

文化抗战的成果即抗战文化也是文化抗战研究的重要范畴,它包括抗战媒体、抗战文学、抗战艺术、抗战学术、抗战教育以及凝聚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

抗战媒体是指广义的传播媒体,包括抗战报纸、抗战刊物、抗战广播、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出版社(书局、书店)等宣传抗战和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媒介。抗战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体是非常繁荣的。仅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大众传播媒体为例,就可以反映根据地的文化抗战的迅猛发展及抗战文化的繁荣发达。在陕甘宁边区,除新华社及党报《解放日报》,还组建了广播委员会,建立了广播发射台,设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主要报纸有《边区群众报》《生产报》《前进报》《冲锋报》《新文字报》《民先报》等近30种,主要刊物有《解放》《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文艺》《文艺战线》《新诗歌》《文艺月刊》《大众文艺》等60余种。其他根据地的大众传媒也获得发展。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战士报》、《子弟兵报》、《冀中抗敌报》、《冀中导报》、《救国报》、《边区导报》等50余种。创办的刊物有《抗战生活》《晋察冀文艺》《晋察冀艺术》《华北文艺》《华北文化》《新大众》《新长城》《群众》等。在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晋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冀南日报》、《太岳日报》、《晋冀豫日报》、《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抗战导报》、《新生报》等30多种,创办的刊物有《文化生活》《抗战生活》《华北文艺》等38种。在晋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有《新西北报》《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地通讯》《前线月刊》《西北文艺》《战斗文艺》等。在华中根据地,创办了《抗敌报》《江淮日报》《新华报》《拂晓报》《抗日战报》《苏中报》《滨海时报》《淮南日报》《淮海报》《盐阜报》《挺进报》《大众报》等100多种报纸及几十种刊物。^①在大后方,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抗战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领着国统区文化抗战的前进方向。

抗战文学是文化抗战重要而又普遍的形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并推动着整个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发展。首先是抗战文学团体繁盛,有党和边区政府领导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中华

^① 黄华文:《抗日战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54页。

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冀鲁豫边区分会、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筹备委员会、苏北文化协会等。由解放区作家自由结社建立的文艺团体，就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歌社新诗歌会、山脉诗社、青年文艺学习会、延安诗会、怀安诗社、草叶社，晋察冀边区的燕赵诗社、战地社、铁流文艺社、晋察冀诗会，晋绥边区的根据地文社，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诗社，华中地区的湖海诗文社等。^①文学团体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小说创作成绩更是喜人。短篇小说成就很大，代表性作品就有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吴奚如《土地在笑着》《老革命碰着新问题》、白浪《杨树》、杜映《代耕》、刘御《儿子到前线去了》、张英《放了足干革命》、柳风《边区故事》、雷加《炮位周围》《一支三八式》、刘白羽《战斗着》、魏伯《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李清泉《一颗石头》、孔厥《调查》等。写游击队活动的有刘白羽《总的突破》、雷加《三个人的阵地》、刘祖春《一个夜间的故事》、杜映《在火光里》等；写勇于与敌人斗争的有严文井《儿子与父亲》、金漫辉《铁蹄下》、刘白羽《在黄河一湾上》、李威深《火车司机》等；写后方生产及动态的有老宁《病》、师田手《劳动日记》、严文井《春天》《一家人》、刘白羽《突击运动》、白晓光《动员》、梁彦《战士的家》、莎寨《红五月的补充教材》、周而复《灾难里》《被炸毁的街市》、沙汀《勘察加小景》《联保主任的消遣》等。这些作品密切配合全民抗战，富有生活气息，起到了动员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思想倾向是健康的，人物形象也相当生动。^②涌现了丁玲、刘白羽、赵树理、孙犁等一大批作家。诗歌创作也获得丰收，朗诵诗、街头诗以其群众性、大众化在根据地获得发展，出现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等著名朗诵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民歌体、群众性诗歌创作也在根据地出现。抗战文学成为抗战文化最有成就的内涵。

抗战艺术是最能感染群众、激励士气的文化形式，包括抗战戏剧、抗战音乐、抗战美术和抗战电影等。在抗日根据地，抗战戏剧最初是以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的形式展开的，出现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等著名的剧目。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秧歌剧和新话剧获得发展。文艺工作者对古老的秧歌进行发掘和改造，创作了新的秧歌剧，服务于抗战。其中《兄妹开荒》成为新秧歌剧的起点和代表作。从此，秧歌剧在根据地特别是延安和陕北兴盛起来。“从一九四三年农历春节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万人次。1944年春节期间，由延安的街道、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业余秧歌队有27个之多，演出了150多个节目。”^③新歌剧的代表作是《白毛

① 刘增杰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29页。

② 刘增杰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131~132页。

③ 刘增杰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267页。

女》。此剧获得巨大的成功,风靡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它的带动下,出现了《刘胡兰》《王秀鸾》《赤叶河》《不要杀他》《孙大伯的儿子》《雄刘四虎》等一大批新歌剧。在大后方,出现了抗战话剧高潮。仅以重庆为例,话剧团体就有怒吼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复旦剧社、青年剧社、教导剧团、孩子剧团、抗敌剧社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办了两届戏剧节,演出了《我们的国旗》《死里求生》《抗战进行曲》《金玉满堂》《钦差大臣》《狐群狗党》《渡黄河》《冰天雪地》等剧。特别是郭沫若创作了一批历史剧,如《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抗战音乐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全中国兴起,著名的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新的女性》等都成为不朽的经典。全面抗战后,进步音乐界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鼓动群众的歌曲,如冼星海创作的《祖国的孩子们》《做棉衣》《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以及张曙创作的《赶豺狼》《日落西山》《洪波曲》,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陈田鹤的《巷战歌》,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歌曲,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深入开展,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音乐创作活动更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歌曲,如《游击乐》《战斗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行军小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碑》《子弟兵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红五月》《大生产》《南泥湾》《反攻》《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军民进行曲》《白毛女》等。

美术是富有感染力的直观艺术,抗战时期木刻、版画、漫画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大后方,抗战美术方兴未艾。在抗日根据地,美术成为宣传抗战的普遍形式,到处是宣传抗战的壁画、漫画,当时描述说:“有人说延安城是标语和图画装成的,这是真话,一座不十分大的城里,无论大街小巷、墙壁上、门板上、土堆上,甚至一棵树上都贴满了……在延安城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一处找不到抗战宣传画和木刻的痕迹。”^①在晋冀鲁豫边区,“墙头画的数量远过木刻,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在本区穷乡僻壤的村庄里,都满布着墙头画”。^②军队的宣传工作者,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我们美术组带着这种标语筒,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画到哪里,踏遍了太行山的山山岭岭。标语在内容上要紧密结合斗争形势,语言要通俗有力,这样才能产生鼓动和宣传的作用。在形式上,尽量美术化,做到鲜明、醒目、美观。有的用白色写字,红色勾边;有的红色字黑色边;有时也

① 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重庆出版社,2000,第93页。

② 刘增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276页。

用投影方法托字。壁画同样以三色组成，有条件时也适当配以其他颜色。山区大都是石屋石墙，平原则大部分是土屋土墙，不管墙壁的条件如何，我们尽量使所写的标语或壁画产生强烈醒目的效果”。^①

抗战电影也获得了发展。1938年1月20日，阳翰笙、罗刚号召建立全国电影界同人的抗敌组织。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并指出“要每一个电影从业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身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号召“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的武器，使它深入军队、工厂和农村去，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的战场”。^②由沈西林、孙瑜、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等优秀革命电影人士参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制片工作，在抗战期间拍摄了许多抗战新闻纪录片，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抗战、鼓舞民众、纪录日本罪行的作用，如纪录“卢沟桥事变”的纪录片《卢沟桥事变》，纪录日军制造“重庆大轰炸”惨案的《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敌机轰炸重庆》《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滥炸重庆》，纪录淞沪空战的《空军战绩》《淞沪前线》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抗战电影活动，虽然物质条件艰辛，抗战电影活动不如大后方繁盛，但是也在抗战中艰难起步，“以战斗的姿态，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又一页，开拓了党和人民军队电影历史的新纪元”。^③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电影社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虽然电影社受物资、人员条件所限，并没有开展拍片活动，但也积极地进行着电影抗战，如下乡深入群众中播放抗战电影。延安革命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的抗战电影社团是延安电影团。1938年春，袁牧之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前往延安，团结延安的电影力量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被称为“人民电影机构的初创，人民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的主要电影活动是拍摄纪录片。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桥山黄帝陵开机拍摄，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晓冰摄影，历时一年多的艰辛，1940年基本拍摄完成。以后又陆续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九一”扩大运动会》《十月革命》《边区生产展览会》《刘志丹同志移灵》《南泥湾》等新闻纪录片。

抗战教育是文化抗战的重要成果。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将沦陷区的大学陆续内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也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西南联合大学，堪称抗战高等教育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抗战教育，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8条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295~296页。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50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第31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156页。

“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①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应该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作为全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报告还明确指出：“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动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②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举办了干部、部队、群众和儿童等四个层次的抗战教育。干部的抗战教育主要通过干部学校、在职教育和短期训练班三种形式进行。干部教育最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文化、地方各类人才。对部队的教育是经常的，主要是爱国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军事技术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对民众的抗战教育是通过冬学、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来进行的。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一般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学习时间为3个月（一般从11月到次年1月）。民众学校是冬学的延续，主要在巩固区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游击区举办，它将教学时间从冬季农闲延长为全年”。^③ 冬学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众教育的新形式。

抗战学术同样是抗战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学术在民国时期有一定的发展，但遭到日本侵略的摧残。大学、科研机构被破坏，被迫西迁，科研人员流离失所。伴随大批科研机构内迁，战时大后方几乎聚集了中国科技界的全部精英。科研工作者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抵抗侵略、复兴民族，坚持科研工作。为了抗战需要，科研工作者中断了原有的科研项目，选择抗战急需的项目进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各学科特别注重科学在国防军事及工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如化学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方面的研究；物理学注重研究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气象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等都十分重视将科学研究与现实结合。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开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地资源，支援后方工农业建设的需要。”^④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工作。1940年2月毛泽东在《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56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重庆），1938，第48页。

③ 赵国娟：《简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军事历史》2011年第1期。

④ 张瑾、张新华：《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6期。

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①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号召：“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我们要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② 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优待科技人员的政策，设立了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陕北通信学校、延安摩托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延安药科学学校、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延安农业学校等科研和科技教育机构以及延安光华农场、农事试验场等农业科研机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抗战学术最大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越来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观点研究哲学、历史、文学以及社会领域，从而产生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李达的《社会学原理》等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扬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先河。因此，就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抗战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建立，并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而确立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主流学术形态。

抗战精神是抗战文化的核心成果，是文化抗战的核心范畴，是引领文化抗战发展的价值内核，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形态。抗战精神体现了“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引领下，抗战思想、抗战媒体、抗战文学、抗战艺术、抗战教育、抗战学术都起到了团结各民族人民、唤醒民族意识、抵御日本侵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共同凝聚起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的一页，是文化抗战的辉煌成果，学术界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文化抗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涉及文化领域抗战的研究，总结文化领域抗战研究的成果，厘清文化抗战的概念、范畴是十分有必要的。

① 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第5页。

② 何志平：《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第388页。

③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3日。

From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o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Concepts and Categories——Center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WANG Jiping, YANG Xiaochen

Abstract: The stud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starts from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Since the end of 1980s,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study change fro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o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are two concepts which are related and different. In the 1940s, Guo Moruo put forward two concepts: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and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refers to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e people in the cultural circle, through various cultural carriers. Anti-Japanese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form formed by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can be formed b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hey have their own research categories and paradigms. Th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leading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in that period. The new democratic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led by the proletariat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culture and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Cultural Anti-Japanese War; Cultural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